

古代文字与古代文化

徐传武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 我的学术贡献

(代前言)

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说：“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善哉斯言！本着这个精神来总结二十馀年的学术活动，我认为自己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典文学方面。我从杜甫诗“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所写星象与当时及现在的实际天象不合入手，运用古天文学与古文獻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了牛郎织女神话起源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原始氏族社会的母权制时期的结论，比传统的牛女神话产生于西汉说，或滥觞于《诗经》时代说要提前一、二千年之久，这对于上古神话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见拙文《试论牛女神话起源于母系氏族时期》）。该文在《文学遗产》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反响；《人大复印资料》曾复印，《文摘报》曾摘引，据友人告知，在台湾的某些大学、在上海的某些大学，讲上古神话时，不少人援引此说。我大学毕业不久，曾对《世说新语》全书予以注译（齐鲁书社先出我一选译本，去年约我再出全注本，一时还未腾出手来对旧稿再进行加工整理），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世说新语〉刘注浅探》一文，对敬胤注，刘孝标注与敬胤注的关系，刘注的原貌、特点、作用及不足之处等都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成了《世说》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

要成果，如王能宪之专著《世说新语研究》<sup>①</sup>就曾多次引用拙论。我对《世说新语》中个别问题的研究也是比较深入的，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如《政事门》“陶公性检厉”一章之“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一句，向以“除”为“台阶”讲，将此句读作“听事前除，雪后犹湿”，我举了多方面理由，认为此句应读作“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以“除”作动词，乃“除去”、“除掉”之意（详拙文《读〈世说新语〉札记》），对传统的以“除”为“台阶”说进行了冲击。去年我读到的吴金华的《世说新语考释》一书，亦以“除雪”为词，且推测“除雪”或为“徐雪”之讹。<sup>②</sup>读之窃有得遇知音之喜。我还曾用“五行说”思想来解读《西游记》，写成《试谈〈西游记〉的五行说思想》一文，剖析了该书是怎样以唐僧取经集团的“五众以配五行”的，反驳了旧时的仅以“三徒”配“五行”之说；论析了“五行说”思想在该书其他方面的表现；考论了随着取经故事的演变是怎样经过吴承恩之手将这种思想添加进来的；论述了吴承恩并未为迁就五行思想而削弱了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鲜明性。用五行说思想研究《西游记》此前尚无人问津，故此文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后除去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外，台湾《历史月刊》出一《西游记研究专刊》收录了此文，又被美国《世界日报》转载，去年全国《西游记》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邀我参加，我之论点颇为学术界赞赏。

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就听师长讲“七实三虚”之说，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常常盘绕于心头，大前年把积累的有关资料逐一整理，又经过一番努力，遂撰成《三国演义》“虚”、“实”辨之专文一百三十余篇，一事件，一人物，逐个辨析。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让人认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还历史与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是让人弄清作者是如何虚构的，或张冠李戴，或移花接木，或聚

---

①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沙成丘，或点石成金，或撒盐入水，或借景入画，无中生有，真中掺假。……其是非成败，亦可给后来的的作家以经验教训。通过这一一辨析，我得出了《演义》不是“七实三虚”，而是“七虚三实”的结论。我曾就此观点向袁世硕先生请教，袁先生亦颇以为然。几个月前我买了一本《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其中有一篇名为《〈三国演义〉的虚与实》的论文，蒲先生说：“《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如果一一对证历史，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评过这部书说‘七实三虚’，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虚构的。照我们看，虚构的部分决不止三分，就是连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经过文艺性的改造的。与其说‘七实三虚’，不如说‘三实七虚’，更其恰当。越是虚构的部分，文艺价值越高。”<sup>①</sup>读之真有点“英雄所见略同”之感。蒲先生此文乃“据手稿抄录，原作于一九五三年，未刊布”<sup>②</sup>，故我的观点决非抄袭，的确是我经过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组专论《演义》实与虚之文曾被十几家报刊发表，有两位教授还撰文于《齐鲁晚报》上赞扬此举，韩国岭南大学金周汉教授等正将此译成韩文拟在韩国出版，台湾陈捷之馆长主编一部《三国演义》的论集，拟收入几十篇我的有关论述。

此外，我还搞了《左太冲集校注》（与牟世金先生合作），还搞有《左思左棻研究》的专著（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左思左棻的各种有关问题都进行了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比如左思左棻的行年问题，与左思左棻有关人物论考，左思左棻作品的散佚存留情况，《左棻墓志》及其价值，左思《三都赋序》论析，左思“野于陆机说”辨析，左思《齐都赋》探微，左棻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的地位，关于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张载入蜀之年考辨，皇甫谧卒年新考，历代左思左棻研究简史，等等，探赜索隐，常言前人所未言。

① 《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 20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 206 页小注，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如关于皇甫谧卒年问题，一向认为乃太康三年(282)卒，享年六十八岁，我经过反复探讨，认为谧若卒于是年，则《晋书·皇甫谧传》后面的有关记述则年序倒置，不合情理，并提出了四点可疑之处，于是用“理校”之法考证谧卒年为元康三年(293)。诚如是，则诸疑皆冰释，与之相关连的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问题，左思访求张载的时间问题，左思《三都赋》撰成于何年问题等等，都能较圆满地得到解决。前年我应邀参加了在韩国大邱市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宣读的就是关于左思左棻研究的论文，颇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我还费多年之力搞了一部《李贺诗集译注》(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李贺的全部作品予以注译。李贺诗向以难懂著称，全部注译其难可知。我于每篇译注之后都加了个“解说”，对于该诗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写作时地以及有争议之处，均作简要说明，对于牵强附会的以李贺诗为“哑谜说”，对把李贺描写音乐的作品等皆当成同情“二王八司马”的诗篇等观点均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该书曾得到唐诗专家萧涤非教授和刘乃昌教授的高度赞扬(详见两位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同时，我还搞了《李贺论稿》的专著(该书由台湾广阳译学出版社出版)，对与李贺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考论，如关于李贺诗的独创性问题、写作时地问题、对神话传说的运用问题、钱钟书论李贺诗问题、《海录碎事》引述李贺诗句问题、《李凭箜篌引》何以置于《李贺诗集》卷首问题、李贺诗是否“少理”问题、与李贺交往的各种人物情况、李贺之病与死的情况、关于李贺佳句的品评等等，多有新意。书中《〈李贺诗集〉叶葱奇注疏纠误献疑》一文，纠正叶葱奇注疏本在引书、注音、释义、疏解等方面存在的错谬或欠准确之处，达数百处之多，亦可见我所下功夫之大，读书用心之较细。

二、《周易》研究方面。我是坚定不移地反对把《周易》当成占卜吉凶的预测学来看待的，也坚定不移地反对把《周易》看作是许多

自然科学门类的源头，正如张之沧先生所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伴随着非常态的‘中国文化热’，创始于伏羲时代的一部《易经》在许多人的心中竟被奉若神明，看作天书；认为只要谙熟《易经》，就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包治百病。一些招摇撞骗者还口出狂言：依据《易经》八卦预测天气，其准确度可以超过中央气象台。还有一些人认为，本世纪所谓的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如相对论及场论的思想，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易经》中就已经提出。”<sup>①</sup>把《周易》搞得玄乎其玄、神乎其神，这实际上是一种向科学与真理挑战的欺骗性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丧风败俗、危及人们精神健康的毒性云雾，这种妖雾弥漫及城乡；连一些高校教师、国家干部也被卷了进去，他们甚至从中进而又起到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是从来不信也不宣扬这种东西的。作为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的我，在《周易》研究方面的成绩主要有两点：一点是研究《周易》的成词问题，详析《周易》中产生的词语以及有关词语在人们使用中是如何演变的，纠正了在使用这些有关词语时的错谬或欠准确之处（详参拙文《〈周易〉成词例说》）。这里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坎离水火与阴阳》，传统看法以坎卦指水、指月，却为阳卦；以离卦指火，指日，却为阴卦；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水”、“月”为阴，“火”、“日”为阳。这种矛盾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从八卦的起源谈起，认为原始的八卦本与阴阳无涉的，仅与观天察地有关，故最初当为数字卦，但八卦已有了取象于日、月、水、火、天、地、父、母等定规，随着筮法的发展，数字卦与阴阳说相融合，数字卦画被抽象为阴阳二类，唯独“坎”、“离”二卦的属性与其所象征的事物之阴阳属性不合，或者说恰好相反，但由于取象已久，积习难改，故而出现了这种矛盾现象。这种看法颇具新意。另一篇是《八卦与八音如何相配》。人们直觉地感到八卦

<sup>①</sup> 张之沧《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易经〉》，见1994年8月31日《光明日报》。

与八音，像八卦与八方、与八风一样是应该能一一对应的，并据班固《白虎通·礼乐》引《乐记》可知。但由于《白虎通》转引的《乐记》的三段文字是有散佚错讹的，而传本的《乐记》又已无这些文字，他书又未转引过，亦无其他资料可作佐证，而据《白虎通》引文是无法将八卦与八音一一配合起来的。怎么办呢？经过反复思索，将三段引文对照勘核，据另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乐记》原文的顺序是依照后天方位按顺时针方向由北方（坎音）开始转到西北方（乾音）而止的，这样就可将所佚的八卦卦名、与八音音名补全，并一一配合齐备，并将引文中出现的错简亦予以纠正。这样，不仅解决了八卦与八音相配的问题，而且将《白虎通》引《乐记》的散佚错谬之处做了补正。问题虽不算大，但解决起来却是甚费功力的。我在《周易》研究方面的第二条成绩，主要表现在《周易》与天文学关系的探讨上。我本拟写一部《周易与天文学》的书，准备好了资料，列了提纲，共分十几大部分。我在该书前面引四库馆臣之语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sup>①</sup>现在有些人把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都到《周易》中找源头，拉关系，亦如这种“好异者”所为，他们所搞的《周易》，已经走了样。我先写好了第一部分“《易》之起源和古天文”，批驳了古人对“仰则观象于天”之义凿实以证之（以《易》之六十四卦皆为天上星象，遂一一以星配卦）之说<sup>②</sup>；批驳了今人将《周易》有关无关之文皆以天文解之的附会之说<sup>③</sup>；驳斥了有些人把《太极图》、《河图》、《洛书》当成什么“全部宇宙数理论和宇宙物理理论的最高结晶”，是什么“亘古一图，包罗了宇宙万物”，是什么“人类认识宇宙的指南，也是现

①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一》。

② 宋人林光世《水村易镜》。

③ 郑衍通《易与天文》，见《易学应用之研究》第一辑，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

代人类建立完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基石”<sup>①</sup>的非科学观点，从中可见我对《周易》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基本态度。<sup>②</sup> 本世纪三十年代，有位赴法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的刘子华先生，1940年以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行星的预测》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该论文在法国出版发行，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大影响。近年“周易热”大盛，刘子华身价倍增，《周易》对天文学的作用更因此而被吹得震天响。我经过详尽的考证，认为刘子华先生在书中所制定的卦与卦之间的配偶律、母子律、分部律，并进而把卦与星球合定，以卦拟星，推测出星球的性质，预测出太阳系第十大行星的存在（刘先生命名为“木王星”）及其速度、密度、对日距离等是不可靠的、不符合科学道理的轻率结论，连科学假说都算不上。近年来许多人大肆宣扬刘先生“八卦测新星”的业绩，并说他这种推测已由第十大行星的被发现所证实等<sup>③</sup>，事实却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讹传罢了。我本拟在《周易与天文学》一书中列专章详论此事，因忙于他事而未果。但由此可以看出，我对一些人胡乱吹捧、无限拔高《周易》对自然科学的所谓“巨大作用”是持鲜明而坚定的反对态度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对《周易》和天文学都下过一番功夫，否则，是决不敢信口雌黄的。

三、古天文历法方面。在这方面的成绩，除去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小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主编《中国名物大典·天象类》（济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之外，就是收在本书中的这组论文了。我结合古籍中的使用情况，比较系统、全面地

---

① 王锡玉《宇宙元素周易经络图》第2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见拙文《〈周易〉与天文关系浅探》，收入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易集要》，齐鲁书社1994年出版。

③ 见《八卦测新星——刘子华追踪四十七年前往事》，载1987年10月10日《羊城晚报》。



介绍了有关五大行星、北极北斗星、二十八宿、分野、汉以十月为岁首以及各种纪年、纪月、纪日、纪时法的各种情形，等等，对于研究、阅读古籍是很有用处的。其中不乏一些独到的见解。如十二星次之一的“鹑火”一词，古人把二十八宿想象为四种动物，南方七宿被想象为一只大鸟，取象于鹑，曰“鹑首”、“鹑火”、“鹑尾”。鹑首和鹑尾被想象为这只大鸟的首和尾，向无疑义。而中间几宿为何名之为“鹑火”？古人或以为与行星之一的火星出没有关，但火星与之并非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故难令人信从。我从“五行配合律”出发，五行中的“火”恰与五脏中的“心”相对应，鹑火乃指“鹑心”，——大鸟的心脏，这样鹑首、鹑火（心）、鹑尾共同合指大鹑鸟，就于理甚洽了（详参拙文《“鹑火”因何名？》）。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水’，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sup>①</sup>现在的古籍注解中、字典词典中，甚至专门介绍天文历法的小书中，这方面的错误还是不少的，我这组关于古天文历法论文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注意纠正这方面的错谬。如关于五大行星之一的“填（同“镇”）星”音义理解上的错误；北斗星“斗杓（同“标”）”音义注解的错谬；“斗箕”、“气冲牛斗”之“斗”应指南斗之星或注为“北斗七星”之讹，“气冲牛斗”之“牛”本指牛宿六星或释为“牛郎三星”之误；“玉绳”、“招摇”本为北斗斗柄旁边的小星，或有释为北斗七星之一者；“曜魄”本指北极星而有释之为“北斗”者；“大火”本指恒星中的心宿，或有释为行星中的“营惑（火星）”者，“大火流”本指农历七月心宿偏西下行，有人释为“六月”偏西下行，不确；“玉羊”本指明月，有人释之为“天狼星的别名”；“玉李”应指金星，或以为指李星，欠确；“黄姑”本为“河鼓（指牛郎）”之音变，有人却因“姑”字而错以为指织女星者；“西陆”

<sup>①</sup>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

为昴宿之别名,当因“日行西陆谓之春”(《后汉书·律历志》)而名,另有指秋天的“西陆”一词,当因《易通统图》“日(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陆”(并非实际天象)而来,二者并非一事,亦非同源,人或释指昴宿之“西陆”引“日行西陆谓之秋”者则误;“璇玑”本指北斗魁首四颗星,或释为“北斗魁第四星”;“勾陈”(亦作“钩陈”)或释为“极星”,欠确(因古今北极星非专为一星,随着时代的演变在变化,且勾陈有星六颗,其中仅有一颗方为某一时代的北极星,故不可笼统地释“勾陈”为“极星”);“农祥”为房宿之别名,因“房星晨正而农事起,故谓之农祥”(《国语》韦昭注),于是乃有“农祥劝耕”之典,或释“农祥”为“以指农时”则误;或释星名“瓠瓜”为“小瓜”;或释“参横”(参星打横)为“参星已落”;或释用例指织女星的“女宿”为北方玄武之第三宿;或释“亢宿”之亢音 kāng(指颈项之意应读 gāng);或释氏宿别名的“本”为亢宿;或释天上的“舍”作地上的“舍”;或释“立春”、“立夏”、“立秋”皆曰“在农历某月某日”(当作“在阳历某月某日”);或以指弦月的“小弦”曰“弧形曲线”者,弦,决非弧形曲线,古语曰“直如弦,死道边”,弦应指半月之形如直线的一边;或又有以“傅说星”为“尾星九星之一”之错;又有本指张华之官职的“司空”而却释为星名之讹,等等,等等,我都做了纠正。像《辞源》、《汉语大词典》这样颇有影响的辞书,这类错误也不少(拙文《〈汉语大词典〉天象词目献疑》仅指出该书前四册之误,后八册还未及写出)。我们在运用这类知识时一定要格外当心,不要以为依据某书而来就确信不疑。古天文历法之学几成绝学,文人学士问之尚难免茫然不知,何况他人?故著述中牵涉到这类知识时往往出错率较高,一般人又难以发现其误。读读我的这些论述,格外引起警惕,需要时翻检一下,或者多少会有所补益吧。

四、文字词汇方面。我在这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字词的解说上有所发现,有所突破,对一些错误的东西有所补正,值得语言文字工作者、辞书编撰者参考。如《此“葵”非彼“葵”》一文,指

明葵有多种，而葵菜与向日葵皆有向阳之性，故易于混为一谈。向日葵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才发现的，十七世纪初才传入我国和被人记录的，故此此前古籍中写及之葵皆非向日葵。晋人杜预注《左传》曰“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今人杨伯峻却批评杜曰：“葵非向日葵，杜注以向日葵解之，不确。”实杜注所言乃葵菜，杨氏驳杜乃“不确”。《中文大辞典》释“葵”有“俗称向日葵”一义，但却引《左传》之例，先秦时怎会有此“葵”，故亦误。拙文驳此类错讹甚多。宋人司马光“唯有葵花向日倾”，之“葵花”，亦非向日葵。《辞源》释“葵”字曰：“有锦葵、蜀葵、秋葵、向日葵等。参阅《本草纲目》十六《草》五《葵》。”好像《本草纲目》中已有关于向日葵之记述，细阅该书此节，所记皆非向日葵。编撰者李时珍卒于1593年，那时向日葵还未传入我中国。《“杨”、“柳”辨》之文，指明杨、柳为同科异属之木，故诗文中二者常通用，“杨可称柳，柳亦可称杨”，二者亦可泛称为“杨柳”，如“垂柳”可称为“垂杨”、“垂杨柳”。文中辨明“柳花”和“柳絮”之别，但诗文中时有“以絮为花，以花为絮”者，如诗词中所写“柳花”、“杨花”即多指柳絮。但笔者通过亲自考察了解，指出杨树亦像柳树有那种“如絮之花”，且也会漫天飞舞，认为把古书中出现的“杨花”、“杨絮”皆理解为柳絮亦欠妥。又指出因“柳”与“留”同音，故自古就有“折柳送别”之习。参照钱钟书说，指出古人还有“折柳寄远”之俗，人或昧之，并指出古人注解此类诗句多误，值得注意。《“岷”字与“岷山”》一文，指出“岷”字已多次见于古籍（包括县志）中，曾用于人之字号、文集取名中，但古今所有字词典，包括地名词典、著名的《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以及当今收字最多的《中华字海》等，皆未收录“岷”字或与“岷”字有关的词。我据收集的多条例句，考察出“岷山”即“箕山”，并考订出“岷”字的读音及“岷山”所指为何山等等，可供遇此字者解难，可为大型字典词典的增补贡献微薄之力。《“疆场”和“疆场”》一文，就左思《咏史诗》残句“李牧为赵将，疆场

得清谧”之“疆场”，我用“理校”的方法，从“疆場”、“疆场”二词出现的时代，二词含义的异同，认为在这里只能作“疆場”而不能作“疆场”，并推测“疆场”一词的来源可能与“疆場”一词有关：“随着时代的递展，可能因为‘場’字越来越冷僻，而可能又受指战地之义的‘战场’、‘沙场’一词的影响，况且‘场’字越来越成了常用字、习见字，指战场之义的‘疆場’一词便常常被人写成了‘疆场’了。”从所举用例最早见于与民众文学关系密切的元杂剧中似也可见这种推测的合理性。《“捧”当作“棒”》一文，认为蒲松龄《富贵神仙》唱词“歌儿舞女美如玉，金银财宝积如山；一捧儿孙皆富贵，美妾成群妻又贤”之“捧”不通，据山东方言说“群、批、伙”之义好用“棒”字，故而此处之“捧”当是因与“棒”字形近而讹。《“𠄎”当以“𠄎”为正体》一文，谓《汉语大字典》收有“𠄎”字，该书书证等引用此字时，该字上部皆从“巳”，拙文从甲骨文、金文、《说文解字》引录的古文字形，特别是山东黄县出土的“黄县𠄎器”上的字形等考察，认为此字上部应从“己”，而不能从“巳”。影响较大的《康熙字典》收录此字作“𠄎”，不确。今人编大字典即便考虑到《康熙字典》的影响，也应把从“己”的“𠄎”作正体而把从“巳”的“𠄎”当不规范的字作附体收录。《说“深芜”》一文，谓收录此词的只有《中文大辞典》和《汉语大词典》，二者或注为“繁杂”，或释为“芜杂”，皆以之为贬意。我从此词的源头，有关用例，特别是《北史·儒林传序》称南学“约简”、北学“深芜”各方面来论证，再加上《尔雅》“芜，丰也”之释，认为“深芜”除有“芜杂”、“繁杂”之贬意外，尚有“繁盛”、“丰盛”之意，可正对《北史·儒林传序》之“深芜”及对北学特点理解之误，可补词典注释此词义项之缺。《“黄花”与“黄花女儿”》一文，指出有的词典释“黄花”为“未曾有过性行为的青年男女”之“男”字不确，指出有的词典释“黄花女儿”曰“旧指未婚的青年女子”不如曰“指处女”或“未曾有过性行为的年轻女子”贴切。同时还指出有的词典释“黄花女儿”为“处女”，却引《三家巷》“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的黄

花女，没得来白费唇舌”来作例证欠确，《三家巷》例或当指年老（有人老珠黄之意）或不漂亮的女子之意。拙文还探测了以“黄花女儿”指处女之源，认为当与“带着黄花的小黄瓜非常鲜嫩可口，人们都爱吃”有关，认为与宋武帝女儿寿阳公主的“梅花妆”并无什么干系。我这个看法虽无直接的书籍记录作证，但从丰富的人民生活上去找依据，我认为这有时候不失为解决古今词语疑案的一种有效方法。《曾参之“参”读何音？》一文，或认为应读 shēn，以《说文》为据；或认为应读 cān，因曾参字子舆，“参”当同“骖”，与舆”义协，并认为《说文》读“森”音“其误久矣”。我认为应从《说文》读森音。再如，“参星”之“参”（意为“三”，指三星相连，但并不读“三”音），“二十八宿”之“宿”（意为宿舍、住宿之意，但不读 sù 而读 xiù），这是因为古音相沿如此。有些字读音后来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人名、地名等专用名的用字还沿袭了古音。指出这一现象很有意义，一些专用名词的沿袭下来的读音往往可以看作是古音的活化石。《“矮”、“射”谈趣》一文，谓清人笔记中记载，一女孩说仓颉造错了字，“射”字从“寸身”，应是个“矮”字，“矮”字从“委矢”，应是个“射”字。这二字应互换过来才是。乍一听满有理，但此乃据楷书析字，不符合造字者的本意。拙文从古文字析上分析“射”与“矮”的本来面目，说明不是造字者造错了字，而是后人据楷书说解汉字不符合文字的本意。现在有些介绍文字的小书还沿袭清代女孩所谓“造错字”之说，岂不是误人子弟吗？古代就有过这种以楷书说解文字的笑话（见拙文《王安石说字》），今天还不乏其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连类推及的一种词语》一文，介绍一种比较特殊的词语，它是从另一个词语连类推及而成。欲溯这种特殊词语之源，需先追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词语”的来源，否则不知其来龙去脉，则令人难知其所云。如“鸭”称“左军”，缘何而来？原来是因为王羲之曾为“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因其爱鹅，世称鹅为“右军”，鹅鸭同类，故称鸭为“左军”。再如妻母称“泰水”，妻之伯叔父称为“列岳”，源于妻父

称“泰山”。又如明代科举考试，设有“出恭入敬”牌，士子如需大便，应先领此牌，后因称排泄大便为“出恭”，又称大便为“大恭”，连类而及，遂称小便为“小恭”了，等等。这类词语与同出一个源头的几个典实不同，也与作为一种修辞方法的临时性词语不同，它已具有独立性和凝固性，由于“转弯”太大，使用率较低，乍看往往难知究竟。对这种特殊词语的研究以往做得不够，此文多少有点开创作用。此外，如《“认”字的又一义项》之文，纠正了有的词典对“认”一词不准确的注解，指出“认”有“纫”字之“穿进”、“钻进”之意，可补大字典、大词典注释此字义项之不足。《谈谈化学家所造字》一文，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化学家所创造的一些新字做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可以视为是对其“完全否定说”的一种“争鸣”吧。《不能随意“类推简化”》一文，对人们书写汉字常用“随意类推简化”之法，把字写得不伦不类或错误层出的各种情况提出了批评及改正办法，对于汉字书写的规范化是有点促进作用的。《沿误成习词语例说》一文，论述由于古书断句，或误解词语而把字词原意搞错，后来则以错就错，出现了沿误成习词语的情形；《与“五行说”有关的词语和典故》一文，探讨由于“五行说”对人们思想和生活的深广影响，因而产生了许多与之有关的词汇和典故的情况。这些探索对于词汇学的研究都是会有所补益的。

五、名物、文化及历史人物方面。我在这方面也有些独到、创意之处。《笔·刀笔·捉刀》之文，除了介绍“笔”和“刀笔”的始用演变之外，我于“捉刀”一词的解析可以说是具有纠谬之功的。我认为古有“捉笔”一词，“笔”既然可“捉”，与笔具有近似功能的“刀笔”当然也是可“捉”的，后之“捉刀代笔”即可作如是观。人言“捉刀”，仅及《世说新语》“魏武捉刀”之事，不确。魏武所捉之“刀”，乃武器；人们常言之“捉刀”，往往指的是“笔”。《聊斋志异》：“赵以巨金纳大僚，诸生坐结党被收，又追捉刀人。”又：“故附君体，以代捉刀；三场毕，此愿了矣。”两例“刀”皆为刀笔，实指为“笔”，前例捉刀还可能受魏武

故事的影响，后例纯同“捉笔”语词，与魏武事全无所涉，人一言“捉刀”，就涉及魏武故事，则“失其考耳”。《关于龟的传说和用典》之文，言龟之传说等，多采掇旧说，无甚新意，但探索龟地位下降之因，实为独到之见：“‘四灵’中龙、凤的地位越来越高，后来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了，麟的地位也未降低，而独龟却一落千丈，成了形容人低下无比的谥词，常用以称指开设妓院的人或指其妻有外遇者。”何因？“我觉得，所以称开设妓院者或妻有外遇的人为龟，可能与更早的记述有关：《说文解字·龟》：‘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所以二十八宿中的玄武之象，多作龟蛇交尾之形。《博物志》亦言：‘大要龟鼈之类无雄，与蛇通气则孕。’龙、凤、麟都是自然界中本无之物，人们把它们设想得多么美好都行，龟却不同了，传说中还有此‘污点’，这个污点，正好可以用来指称开设妓院者或妻有外遇者的缘由。诚如是，则含此二义的‘王（忘、亡）八’，也只能来源于龟的俗称为是。现在骂人曰‘王（忘）八’、‘王（忘）八蛋’、‘王（忘）八羔子’，则词义从此二义又有所扩展了。”谓龟从“四灵”降至极下地位之因，此不失为有价值的一家之言。《“上巳”与“三月三”》一文，指出汉代之前的“上巳节”，必取三月上旬巳日，不一定在农历三月初三，大约曹魏以后才把三月三日当成较为固定的“上巳节”的。有人把《诗·郑风·溱洧》中写到的“上巳节”当成三月初三，乃不知上巳节演变的历史，以后观前，因而致误的。《“土圭”仪器非“土”制》一文，指出“土圭”之“土”，同“度”，乃测度、测量之意，或以为此仪器乃泥土所制，乃犯望文生义之病耳。《有关曾子的记载和传说》一文，详细地考论了曾子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其主要特征和贡献，主要言行有哪些，辨析了有关曾子的记载和传说中的大量的编造成分，有利于恢复曾子的历史真面目。《南武城，今何地？》一文，详细论证了“南武城”与“武城”并非一地，许多人错当成一地之因，“武城”之名的变革等等，驳斥了某些地理辞典、古籍注疏之讹误。《刘桢应是宁阳人》与《刘桢为宁阳何处人？》二文，指

明刘桢的籍贯应是宁阳县而不是东平县，且利用考古调查资料，进一步论证刘桢的籍贯是今宁阳东北二十公里处的埕城镇。《〈晋书·夏统传〉之“高行”应是人名》之文，指出了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的标点不确之处。《称蒲松龄“聊斋先生”因《聊斋志异》辨》之文，指出了有人说的“以先生（指蒲松龄）有《聊斋志异》一书，故世多称聊斋先生”之欠确，《“赠人以车不若以言”非曾子语》之文，指出了钱钟书信中的一个笔误。《对〈钱钟书论学文选〉的两点建议》之文，一是希望补全选文的出处，二是选文原有错谬或不准确之处，希望得到改正或指出为好。等等，等等。

我所撰写的论文有几十篇曾在《文学遗产》、《文献》、《文史》、《文史哲》、《辞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学术研究》及台湾《汉学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中国文化月刊》、《大陆杂志》、《中国书目季刊》、《历史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有的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被《文摘报》等转引。友人曾说：像论牛女神话起源的，论皇甫谧卒年新说的，论《世说新语》刘注的，论《西游记》五行思想的，论八卦配八音的，等等，非我之学识功力不能写出。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少也是应报刊之约的应景之作，没有多少新意。朋友说，还有些人爱读。那就留着吧，借此也可做个小结。以前搞的面较广，好处是对打基础有利，不好处则是火力不够集中，以后我则要重点打些攻坚战了。

乡贤潘玉斋先生读了我的诸论著后作诗二首以赞之。其一曰：“三都赋就竞传闻，骊颌探珠识度新。据典发微穷奥妙，引经知著见高深。钩玄撮要文兼质，正讹存真古与今。漫道子云含白凤，文心才气每相亲。”其二曰：“稚榻衔杯乐未央，翩翩才调自行藏。青桐聚凤夸丹井，赤日生辉骄绿杨。抱璞何须三献玉，犀牛未必九回肠。英



年一觉生花梦，满目琳琅入妙章。”<sup>①</sup> 谬奖实不敢当，录之以为勉励鞭策耳。

按中国传统的虚龄计岁法，前天——农历腊月初五，是我五十岁生日。照孔老夫子的说法，已届“知天命”之年，可惜我至今也未能真的“知天命”，做事或不知其可为否而竟为之，或已知其不可为而仍为之。回首半百经历，自来山大读书至今恰为半百之半，这“半百之半”中又有一半的时间主要是在读书、学习、提高，另外半个“半百之半”才主要是用来著述的时间。虽然做出了些许成绩，实在不敢、也不值得骄人。想年轻的王弼去世时年龄还不及我现在的的一半，他短短的一生中做出的成绩，像我们这样的人怕是再活五十年也达不到的。不过，聊可自慰的是，我一直不敢懈怠，一直努力向前。刘梦溪先生还说：“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sup>②</sup> 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如果按阳历计，今天则才是我的生日。前天妻说买个蛋糕庆祝庆祝，我说不必了，随便做点菜就可以了。我需要的是时间，是清静，这部书稿整理成形了，这篇前言也写完了，觉得比吃个蛋糕还享受呢。

徐传武于山东大学冷藏室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五日晚

① 潘玉斋诗第一首载于《宁阳文史资料》第五辑，他补写了第二首后一块寄予我。

②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载 1996 年 12 月 25 日《中华读书报》。